

想起当年“交公粮”

封志良

那是一年中最酷热的时候，阳光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，水泥坪上也没有遮阳的地方，交粮的农民在粮站门口排出了一条长队。他们有的取下头上的草帽在扇着风，有的则索性钻进了拉粮的板车下，但头上仍不时有密密的汗珠冒出来。那是我年少时随父母到粮站“交公粮”时的情景。虽然时间过去了很多年，但那一幕幕场景仍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显现。

那时候，家乡农田都种早、晚两季。每年“双抢”过后，新稻谷收回、晾干，还未进仓前就得把粮食交到粮站。公粮分为征粮和购粮两部分。征粮没有一分钱，购粮则按亩计算，由国家定的价格收购，但结账时必须扣除农业税、农田水利费、教育附加费等。至于交多少，村干部会按政策计算好。他们也会在合适的时间，挨家挨户去发通知单，通知村民什么时间段去“交公粮”，不能逾期。那张单子上既标明了各家的人口和田亩数，也精准核算了该年应该上交稻谷的斤数。

我的老家罗桥是常宁有名的“粮仓”，田、土、山都相对较多，因此每家每户所要上交的粮食也就相应多些。当时，村民分得的水田既包括田垌中的良田，也包括山冲里的梯田。我家五口人，每人分得的田、土、山都超过一亩，加起来有六亩左右。印象中，我家每年上交的粮食都得超过1000斤。如碰上收成好的年份，家里粮食就交得多点，父母能领回一点钱。如碰上收成不好的年份，家里粮食就交得少点，父母则需带钱到粮站结账。

我曾随父母不止一次到常宁马桥粮站交过粮食。最初的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，那时家里还没有板车，父母得用自己的肩膀把粮食挑到粮站。印象中，天还没亮，父亲就得备好两副扁担和箩筐。大箩筐，装得很满，由父亲挑。小箩筐，装大半筐，由母亲挑。那时候，父亲30多岁，虽然还年轻，力气也挺大，但挑个百五十公斤，走七八里路到粮站也得“歇好久肩息”。记得父母那次去粮站时，也早早叫上了我，他们吩咐给我一个看守粮食的任务。当然，我也乐意去，屁颠屁颠地跟在父母后面，那时候全然没有顾及父母的辛劳，只是惦记着在交完粮后，要他们给我买根冰棍或几颗水果糖“犒赏”一下。

此后几年，家里“交公粮”开始用板车拉，那时我已经10多岁了。把粮食用化肥袋子装好，抬

上板车后，父亲在前面使劲拉，我和母亲则在后面用力推。那种艰难行进的场面，现在想来依然觉得心酸。再后来，每个村子都铺了水泥路，父母送粮就开始雇拖拉机来拖了。装完车，我和母亲坐在拖拉机前排，父亲则坐在后面，防止装稻谷的袋子从车上掉下来。虽然依然要经受太阳的炙烤，但还是比此前肩挑手拉时轻松多了。

印象中，每次到达粮站，都是人头攒动，水泄不通。等到轮到我家时，父母把早已卸下的一袋袋稻谷轮流搬到大磅秤上去称重，我则在原地看守。那时候，粮站工作人员拿着一把中间有个长槽的锥形的尖刀样的东西，往装稻谷的麻包或肥料袋子中刺进去，进行抽样检查。拉出来时，那槽里便带出了一些稻谷。掺没掺杂物或瘪谷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检查是否晒干，他们则另有办法：从槽中拣两颗谷子放嘴里嗑一下，如果咯吱响就说明合格。反之则不合格，他们就会拒收。交粮的农民还得打道回府，晒干、车干，下回再来。但在我的记忆中，那时候的乡亲都很淳朴，重新拉回去再来交的情况基本没有见过。

我最后一次随父亲去“交公粮”是2001年。那一年，我高中毕业，考上大学，但3000多元一年的学费让父母开始犯愁。看着父母每天板着的面孔，我也始终高兴不起来。好在当年田里的收成还不错。如果卖掉家中粮食的三分之二，再借点钱也能勉强让我入校就读。但不如人愿的是，当年我们还得去粮站“交公粮”，这就意味着有三分之一的粮食得上交给国家。在粮站，当父亲把一袋袋粮食搬上磅秤时，我五味杂陈，心想，政府要是能取消这个政策该有多好！如若这样，父母为我的学费就不会如此为难，也不需要到处去求人，东借西凑了。

一缕春风拂大地，各地农民笑开颜。果不其然，不久，农业的春天真的来了。国家在这一年开始对种粮农民实行粮食直补。当直补资金通过涉农补贴“一本通”发放到父亲手中的那一天，他不知有多高兴了。记得那时，我还在读大学，他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宿舍，说：“过去都是村里、镇里三番五次催我们去交农业税，去粮站交粮，现在种田还可以领到补贴款了。今年，我们家几亩田也领到了政府好几百哩，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啊！”我在电话那头连连称是，父亲则哈哈地笑出了声。

2006年，国家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。从此，我随父母到粮站“交公粮”的那段历史便成了永远的回忆。

忘不了我的母校

谷彦平

去上学。

学校七八个班，琅琅的读书声此起彼伏，老师们也在各个班级教室门前吟诵着经典词章。

上课了，校园里静悄悄的，老师们45分钟，科学安排时间，混时间填鸭式的教学，不会在石塘小学出现。

为了让学生写好作文，老师带着学生一边参加劳动（如种菜、种红薯、捡茶籽等），一边指导学生如何写作。大队放电影，银幕挂在学校大操场上，老师在哪里，学生们就围在哪里。师生共同看露天电影，老师就影片内容绘声绘色地给孩子们讲故事，让孩子们受益匪浅。

由于校舍老化，许多教室墙壁开裂成为危房。2008年，教育局和乡政府决定拆掉一些旧教室，修建一栋新的教学楼。建成后的教学楼一共三层，六间教室，钢筋水泥结构，内外装修都非常漂亮，还将教学楼前的泥巴球场荡成了水泥球场，圈上了新围墙，安装了新大门，校园面貌焕然一新。

在城市化的进程中，大量农村人口到城市务工，他们大多数在城里购置了房产，孩子们也随父母进城了，留在石塘村的居民越来越少，在石塘小学上学的孩子也越来越少。到2014年，一个学生都没有了，学校自然停办。

当年轰轰烈烈的石塘小学就这样消失了。一想到这些，我的心中很不是滋味，怅然若失的心情油然而生。

但我转会一想，这不也是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吗？

今天，我们怀念石塘小学，不只是怀念学校的校园环境，更要在心中铭刻石塘人的精神，弘扬那种不忘初心、自力更生、不怕困难、勤奋好学的风气。

邵阳晚报

8611110

本报新闻热线



木槿有缘

刘新昌

认识木槿花虽然只有两年时间，可我觉得，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。

2016年6月，我从长沙借调到湛江工作，新单位位于湛江市赤坎区金沙湾滨海浴场旁。金沙湾是个旅游度假区，那里有湛蓝的天空，高高的椰林，柔软的沙滩，碧绿的海水和浅飞的海鸥。

初到沿海，满眼都是新奇。上班时，我喜欢在开着冷气的空调房里，找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泡一杯挂耳咖啡，边工作，边欣赏近在咫尺的蓝天碧海金沙滩，心中确实会涌起一种“面朝大海、春暖花开”的小确幸。

到了周末，又会约上朋友同事，东海岛、南三岛、硃洲岛、特呈岛、赤豆寮岛……一个岛屿一个岛屿地逛下来，吹海风、看日落、吃海鲜，欣喜且惬意，有时，还会跟着渔民去海边挖沙虫、捡海螺、摸蛤蜊、捕海蟹，新鲜又刺激。

然而，这种新鲜的劲儿还没过去，我却因水土不服，忽然病倒了，满嘴燎泡，头昏目赤，绵软无力。我去附近药店买药，服务员笑着说：“你这个症状，不需要吃药，喝点木槿花茶就好了。”

“木槿花茶，你店里有卖么？”我问。

“这个不用买，湛江到处有，你只需将木槿花洗净，加水煮20分钟，再加适量蜂蜜，再煮沸，就可以喝了。”服务员微笑着说。

“可我不认识木槿花啊。”我有些为难。

“门口那树紫色的花就是木槿花啊。不过，我建议你回小区里采摘，马路旁的木槿花怕有汽车尾气。”服务员细致周到，始终微笑着，让身处异乡的我忽然间有点感动。

走出店门，仔细瞧了瞧这株木槿，树干手腕大小，树冠如伞打开，墨绿的枝叶上长着细细密密的绒毛，一朵朵喇叭状的紫色花儿开在绿叶间，薄如蝉翼的花瓣在风中摇曳，一根长长的花蕊从花心中凸了出来，像定海神针插在花瓣里，凑近闻闻，木槿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

我沿金沙湾的林荫小道回到住处，果然在住处看见许多木槿花，于是按照药店服务员的介绍，动手熬了回木槿花茶。没想到，这木槿花茶滑嫩爽口，吃起来像杏鲍菇一样细腻，不过没杏鲍菇有嚼劲，总的来说，比平时喝的菊花茶味道好多了。我接连喝了几次后，身体很快就康复了。从此，我和木槿花算是有了交情。

后来，无论我走到哪儿，只要看见木槿花，都会驻足停留一会，看看花，或者说让花瞧瞧我，那种花与人之间的心领神会，似乎只有朋友间才能做到。

去年回长沙后，我在小区里发现了两株重瓣木槿花，花开得繁繁复复，层层叠叠，样子有点像牡丹，这种重瓣木槿虽好，却总觉得不如单瓣木槿那样简单、亲切。

前段时间，女儿放风筝损伤了膝盖。我带她去长沙市中心医院做检查，女儿害怕抽血，坐在抽血室哇哇大哭，极不配合，我急得手足无措。这时，一个年龄稍大的护士阿姨走过来，她抓着女儿的手，一会儿夸女儿的小手漂亮，一会儿给她讲个故事，一会儿说个笑话，说话轻言细语，动作温柔体贴，等女儿回过神时，血已经抽好了。

傍晚，检查完从医院出来，我迎头撞见一树单瓣木槿花。那紫色的花瓣，在晚风中，如蝴蝶在枝头上翻飞，它摇动着裙摆，仿佛一个老朋友在向我点头微笑。我本来抑郁的心情，立马被这道明亮的紫色霞光所照亮。

记得以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，叫《万物皆有情》，可现在想想，万物还皆有缘，你与他们有缘时，他们自会在你生命的某个时刻以温柔的底色悄悄呈现，一如木槿花和那两位不知名的女性。